

两晋之际吴兴沈氏考^①

陈 群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875)

摘要: 吴兴武康沈氏是南朝最为活跃的南方土著家族, 而其势力之崛起则可溯源至两晋之际。由于三吴文化高门在亡国后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从而为地方土著豪强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沈氏即在此时借其他豪强相互残杀之机登上了历史舞台。

关键词: 吴兴沈氏; 南方土豪; 文化士族; 武力强宗^①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89X(2000)04-0068-03

A Study of the Shen Clan in Wuxing during the Dynasties of Eastern Jin and Western Jin

CHEN Qun

(Department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Shen Clan in Wuxing was the most active clan in the south of China in the South Dynasty, and its rise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the dynasties of Eastern Jin and Western Jin. Since the scholar-officials were heavily struck when their state Sanwu perished, the local armed forces had a chance to develop quickly. It was then that the Shen Clan took the chance to strengthen itself and presented itself on the historical arena.

Key words: the Shen Clan in Wuxing; local tyrants in the south; scholar-officials; the greatest armed force

在南朝历史上, 吴兴武康沈氏作为南方土著, 尤其引人注目。南朝四代, 沈氏累世贵显, 其声势可与南方文化旧门吴郡张氏并举。^① 魏晋时期郡望较顾、陆、朱、张为低的吴兴武康沈氏为何能在南朝崛起? 对问题的溯源则意味着考察两晋以来沈氏状况的必要性。

两晋之际曾一度出现南方土豪政治上活跃的局面, 其中即包括吴兴武康沈氏。当时以武装实力的强悍著称于世的还有阳羨周氏、长城钱氏及徐氏等。中经东晋百余年, 侨姓士族在政治上占据绝对统治地位, 南方土族则备受压抑, 更不用说这些地方土豪势力, 其仕宦类皆寂尔无闻。但延至南朝, 沈氏却再度兴起, 而当年势力与之相侔甚至更胜一筹的周氏、

钱氏却并未显示出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陈寅恪先生将东晋初年孙吴旧统治阶段分为二类: “一为文化士族, 如吴郡顾氏等是, 一为武力强宗, 如义兴周氏等……吴兴及从吴兴分出的义兴周、沈、钱等族则为地方武力强宗, 最为豪霸。”^[1] 孙吴在江东建国, 最终走上江东本土化道路, 在其统治政权中占绝对地位的是吴郡顾、陆、朱、张, 会稽虞、魏等文化士族、名家大姓。^[2] 相比之下, 武力强宗则不受重视, 在中央的仕宦也不突出。南齐时沈约曾上书弹劾东海王源与富阳满氏联姻, 指责“王满联姻, 实骇物听”^[3]。俨然以士族的代言人自居。但考沈约《宋书·自序》所叙沈氏, 在孙吴时并无显迹:

^① 收稿日期: 2000-04-16

作者简介: 陈群(1972-), 女, 江苏淮阴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 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

沈宪,左中郎,新都都尉,定阳侯,才志显于吴朝。沈矫,以节气立名,仕为立武校尉、偏将军、封列侯,建威将军,新都太守。孙皓时,有将帅之称。

《自序》中追叙沈氏家世颇详,但亦不免浮夸,且年代久远,无以为征。沈宪、沈矫仕吴为地方官吏,所治新都郡偏处一隅,地位并不重要。而入南朝之初的沈氏其他支系重要人物,如沈演之、沈庆之、沈昙庆、沈怀文等,其先世均不见于记载。东晋初年南方土豪的重要代表沈充,其先代在《晋书》中也一无所考。正史中唯一可考的有沈友:“友字子正,吴郡人……弱冠博学,多所贯综,善属文辞。兼好武事,注《孙子兵法》。”孙权以礼聘之,但他“正色立朝,清议峻厉,为庸臣所讟,诬以谋反,权亦以终不为己用,故害之,时年二十九”^[4]。沈友以博学懂兵法为孙权所聘,后来的吴兴沈氏则虽武力自显,亦有兼以文事传家者。魏晋以来,沈氏人物类属三吴,但未审相互关系如何。

由于孙吴建国所走的特殊道路^[1],在全国居于经济、社会地位最高层的是以吴郡顾、陆、张、朱为首的吴四姓及会稽贺、纪等名姓。《世说新语·赏誉》注引《吴录·士林》曰:“吴郡有顾、陆、朱、张,三国之间,四姓盛焉。”“吴郡顾、陆四姓长者,世有高位。”^[3]在地方上,四姓弟子大量出任郡县守令,“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9]。三吴士族虽然在地方上拥有经济和文化的、政治和军事的强大势力,但他们仍倾向于将自己的家族利益寄托于孙吴皇权,从而双方形成了荣损与共的关系。在君臣名份下,更有姻亲和私人情谊。如孙权称吴王后,曾亲拜顾雍老母于庭前。为保护这些名姓大族的利益,孙吴除政治上给予仕宦特权外,又实行赐客复客制、世袭领兵制等种种优惠政策,以致形成了“吴名郡大姓,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7]的局面。江东士族凭借实力成为孙吴政权统治江东的得力助手,所以史称孙权“外仗顾、陆、朱、张,内近胡综、薛综,是以庶绩雍熙,邦内清肃”^[8]。而江南地方土豪虽有武功,却终不得崭露头角。

公元280年,孙吴为西晋所灭。在这亡国惨剧中,受损最大的当数与皇室肢体相连、荣损与共的吴四姓。灭吴后,对“难安易动”的吴人,西晋政府采取了一定的笼络手段,“其牧守以下皆因吴所置,除其苛政,示之简易”,“吴之旧望,随才擢叙”^[9]。然而,世易时移,异国王庭终非昔日可比,四姓一时沉寂下来,从前文武双修的家族发展成纯粹的“文化士族”。不过,他们终究不甘心政治上的寂寞,为重振家族,

不久又纷纷出仕北方。但长期以来历史地域差异而形成的南北隔阂,使北人普遍采取排斥南人的态度,当发生政治利害冲突时,矛盾便更为激化。南人此次出仕不仅未达到宦官通达,隆族兴家的预计目的,有的反而人格受辱,至而亡命他乡^②。

西晋灭吴导致吴四姓势力骤衰。但对江南武力强宗而言,这一重大事件不仅没有太多不利影响,相反,他们因此获得了一个比较宽松的发展环境。孙吴皇朝下,顾、陆、朱、张等一流士族作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其种种特权得到了国家保障。钱、沈等则仕宦无所见,政治上获利不大。随着国家灭亡,吴四姓的政治优势也因之削弱。西晋灭吴后,将防范的重点放在那些原来作为孙吴顶梁柱的人物上,而势力限于地方的土豪既非监控对象,来自吴四姓的压力又大为减轻。同时,四姓人物远离家园,出仕中原,不仅仕途不得意,而且遭到很多毁灭性的打击,而吴兴土豪却因固守本土,在乡里稳定地发展起来。等到晋末政局动荡,在北方备受压制的南方士族纷纷还乡,希望借机实现复国的梦想。^[10]这时南土士族两个阶层的势力对比已发生变化,永嘉六年(312年)顾荣临死时,吴郡内史殷祐赞誉他“众无一旅,任非藩翰,孤绝江外,王命不通,临危独断,以身殉国”^[11]。顾荣出身于吴郡顾氏中实力最强的一支,“祖雍,吴丞相。父穆,宜都太守”。荣本人则是“南州望士”^[11]。他当日平陈敏之乱时的困境说明,连顾荣这样昔日文武盛极一时的人物也只能以名望得到南北士族推崇,并无多少实际的武装实力。

史称两晋之际,“江东之豪,莫强周沈”^[12]。周、沈之外,又有豪宗长城钱氏,各自势力发展细节则不尽相同。在时间上,钱周兴起最早,沈氏略晚,势力则以周最强。这两点差异,对沈氏宗族以后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③钱氏兴起最早,钱璠追随周玘平定陈敏之乱,却在争夺江东霸权的过程中为实力更强的周玘所灭。诸豪之中,周氏最强。阳羨周氏与势力仅限于地方、仕宦无所见的钱、沈情况有所不同。《三国志·吴志·周鲂传》:“周鲂字子鱼,吴郡阳羨人也。少好学,举孝廉,为宁国长,转在怀安,后官至鄱阳太守。”“子处,亦有文武才干,天纪中为东观令,无难督。”周氏与孙吴政权有较多的接触与联系,必定也能享受国家保障的种种特权,不能纯以土豪视之。吴亡,周氏一无例外地遭到冲击。周处入晋后因得罪权贵,被逼死沙场。周处虽死在中原,其子周徽、周靖、周札却始终留在南方。阳羨周氏真正染上豪强色彩当在此时。两晋之际,周氏讨平江南

地方势力,建立了“三定江南”的业绩。周氏家族的特点与经历使它更易于和当局合作,以求居中取利。但“三定江南”后的周玘实力几乎能左右江东政局,引起了脚跟尚未站稳的司马睿集团极度不安。自此,阳羨周氏遭到了两次毁灭性的杀戮:一是建兴三年(320年)周勰之叛。周氏为司马睿集团所抑,愤恨而死,子勰为报父仇起兵。事发后,司马睿派周勰同族周筵、周札等平定叛乱。第二次是在王敦叛乱时。周勰之乱中,周札等人权衡利弊,大义灭亲,但终究心有不甘,于是,在王敦起兵后,于建康开城门内应。王敦拉拢三吴豪强,一时间,其集团汇集周、沈、钱诸支。而沈氏形迹确切见诸史书者,始乎此。

沈充,“少好兵书,颇以雄豪闻于乡里。敦以为参军。充因荐同郡钱凤……敦以(凤)为铠曹参军”。钱氏遭周氏打击后,势力已衰,钱凤遂欲借王敦、沈充之手灭周氏复仇。钱凤进计王敦:“夫有国者患于强逼,自古衅难恒必由之。今江东之豪莫强周、沈,公死之后,二族必不静矣,周强而多俊才,宜先为之所,后嗣可安,国家可保耳。”^[12]王敦遂派沈充统兵,尽灭周氏。沈充也继钱、周后势力突起。但好景不长,太宁二年(324年),王敦集团兵败。沈充本自吴兴起兵,率万余人响应王含,这时被迫退回故里,不久为部将所杀。

两晋之际吴兴豪强消亡乃是“由司马睿集团为首的渡江士族与丹杨、吴、会稽诸郡豪门士族结成的政治共同体”共同“排斥拥有武装实力的吴兴郡的豪门士族”的结果。^③这是两晋之际吴兴豪强消亡的根本原因。吴、会文化士族欲借诸武力强宗之手实现复国梦破灭后,便转投司马睿集团,他们的行事鲜明地体现了魏晋门阀仅为“家族计”的特点。钱起最早,周最强,因而遭忌亦最深。在这些地方豪强身上,江南任气好武,血族复仇的风气表现得更为明显。钱、周、沈为消灭敌对势力,称雄江东,相互屠戮,不遗余力。沈充起兵加入江东政治活动时间较晚,得实利却最多。他借王敦之力吃掉了实力远强于己的周氏,至王敦兵败,钱、周两家可以说已均无太大力量。但东晋统治者为了缓和江东矛盾,对乱党没有过深追究,后又诏敕敦党,免官禁锢。吴兴豪强沈氏在晋初政治中昙花一现后,又重归地方。

北方门阀在江电站稳脚跟后,便出现了政治上统一天下的局面,南人则普遍遭到压抑,作为地方豪强的沈氏更不可能有所作为(沈叔任为益州刺史已是东晋末年事,时情况有特殊性)。但是,为缓和矛盾,北方门阀视政治为禁脔的同时却在经济上作出

了一定的让步,即将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平原地区让给吴姓士族,自己另辟他土。从而这百余年中,江南地方豪强实力自不可小窥,但其发展的具体程度尚待进一步探索。而作为地方豪强的吴兴沈氏的情况却可提供某些研究线索。

《晋书·沈劲传》:王胡之为吴兴太守,迁司州刺史,上书启用沈充子劲,“吴兴男子沈劲,清操著于乡邦,贞固足以干事。且臣今西,文武义故,吴兴人最多,著令劲参臣府事者,见人既悦,义附亦众”。义附,即“义故”、“门附”的合称,指公府或郡国的幕僚掾属,其身份近于家臣。从沈劲被征辟产生的影响可以看出,沈氏在当地具有相当的号召力。沈充事败后,其后代仕宦遭禁的时间并不长。

东晋时沈氏另一支沈警出为府佐的经历最值得关注。警为沈约高祖,《自序》称:沈警“家世富殖,累千金……为东南豪士”。沈警曾两度出任府佐:一次为后将军谢安命为参军;一次为前将军、青兖二州刺史王恭引为参军。沈警告退后,王恭又辟其子穆夫为前军主簿,极尽拉拢之能事。《晋书·谢安传》:谢安为尚书仆射,领吏部,为后将军。据万斯同《东晋将相大臣年表》,谢安为尚书仆射,领吏部时间在孝武帝宁康元年(373年)九月,则谢安引沈警为参军时间大致亦在此时。这时的政治形势是:7月,泉雄桓温病死,百废待举。谢安新为朝廷所用,但当时桓氏家族桓冲仍当权,是主要政治对手。在朝廷上,更有名望胜于他的王坦之。谢安在朝野均无党援^[3],他引南方土豪沈警为参军,说明中央当权者对沈氏已予以一定的注意。王恭居长江下游军镇,与中央司马道父子对抗,主要仰仗北府兵。他先后征辟沈警父子,尽力拉拢,说明对方实力确实不凡,已成为北人内争中值得注目的力量。当然,其时仍是北人占主导地位,沈警两次出仕,却都很快便告退回家,这是其乖觉之处。沈约称“无仕进之意”不过是虚誉之词。晋末,孙恩、卢循之乱,南方土豪群起响应,纷纷出任伪官,沈氏亦为其中一员。作为南土强宗的吴兴沈氏从此在刘宋建国过程中真正得到重视。

东晋南朝以来,江南的社会风气发生了明显的改变,由原来的轻悍好斗、尚武善战向敦庞怯弱转变,至东晋后期,已出现了吴人不习战的现象。^[14]但沈家历世名将,尤为善战,整个家族也因军功而兴起,这与当时的社会主流殊为不合,历代史家常视之为特例。陈寅恪先生根据沈氏累世信奉天师道、好武善战的两大门风特点与南方少数民族的某些相似现象,从而作出沈氏可能为南方少数民族溪族的推

论以资解释。^④推论体现了一代大家的卓越史识,但惜哉论据不足。倘能转移视角,由沈氏所处地理环境出发作一解释似更合理。

沈氏郡望吴兴武康,地理位置大致相当于今浙江德清。这里地形复杂,是古代少数民族活跃地区。吴兴之役,始于孙皓宝鼎元年(266年)十月,因永安山贼施但聚作乱,事平,皓因分“吴郡阳羨、永安、余杭、临水及丹阳故障、安吉、原乡、于潜诸县……镇山越,且以藩卫明陵……为吴兴郡,治乌程”。^[13]山贼即山越,可见吴兴地区在孙吴末年少数民族仍很活跃。武康,“汉为乌程、余杭之境。初平中始分二邑,置县名曰永安,属吴郡。吴宝鼎元年始置吴兴郡,以永属焉。晋平吴改曰永康,后又改曰武康”。其“邑境在群山之间,涧水交流,聚而为溪”。^[14]根据这样的地形特点,陈寅恪先生推论吴兴可能有溪族自有一定道理。武康域属三吴却远离平原地区,境内天目山余脉交错环绕,地形较为封闭,其西北邻近山区为山越活动地。^⑤同太湖、杭州平原地势平坦,开发较早,从而发育出吴四姓及虞贺孔魏这样的文化土族相对应,这种险岩深渊、关隘阻隔的地理形势更有利于地方豪强拥兵自立,形成区域性势力,两晋之际吴兴豪强的兴起与此当不无关系。同时,当整个南方社会风气逐渐由武入文,这里则有可能滞后一步。《宋书·朱龄石传》:“丧乱之际,武康人姚系祖招聚亡命,夺为劫盗,所居险阻,郡县畏惮不能讨。”险峻的地形,显然为那些武力强宗提供了便利,而这正是吴兴沈氏这样的武力强宗兴起的自然地理环境之所在。两晋之际吴兴沈氏的门风特征及势力发展,为其进入南朝后的兴起创造了历史条件。

注 释:

①据周一良先生统计,宋荆州刺史北人有16宗室得13南人惟沈攸之一人。而侍中一职,宋南人有15,吴兴沈氏得其四。见《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

②据《晋书》卷五四《陆云、陆机传》、卷六八《顾荣、纪瞻、贺循传》,当时出仕中原的江南士族有号为“三俊”的吴郡顾荣、陆云陆机兄弟及会稽纪瞻、贺循等。顾荣官为郎中,历尚书郎、太子舍人、廷尉正;陆云兄弟初屈身为中原官僚府佐,原孙吴尚书陆喜仅得了一个散骑常侍的闲职;纪瞻,召为尚书郎;贺循,补太子舍人。诸人仕宦曲折,备受屈辱不言,当中原诸王内争之际,他们厕身其间,身不由己,几有生命之虞。赵王司马伦败,顾荣差点丢命。阳羨周处,因得罪西晋宗室,惨死沙场。吴士名彦陆云陆机兄弟,以南方一流士族入仕中原,却屡遭嘲讽,仕途坎坷,终而为人所诬,葬身他乡。

③关于吴兴武力强宗钱、周、沈等兴起与发展的具体活动,王志邦《东晋的建立与江东士族》(《六朝江东史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中有较为详实的叙述和论证。

④陈寅恪先生在《魏书司马睿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中》据《世说新语·雅量篇》第38条“钓碣”词义考释,以为“碣”应为“狗”,并据此提出沈氏可能为溪族。

⑤关于浙西北地形及区划参见谭其骧先生《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划——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长安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参考文献:

- [1] 陈寅恪. 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九篇)[M]. 黄山书社, 1987.
- [2] 田余庆. 孙吴建国的道路[A]. 秦汉魏晋史探微[C].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 [3] 沈约. 奏弹王源[A]. 文选(卷四十)[C].
- [4] 建安九年注引吴录[A]. 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C].
- [5] 陈琳. 檄吴将校部曲文[A]. 文选(卷四十四)[C].
- [6] 陈寿. 朱治传[A]. 三国志·吴书(卷五十六)[C].
- [7] 陈寿. 邓艾传[A]. 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七)[C].
- [8] 陈寿. 陆凯传[A]. 三国志·吴书(卷六十一)[C].
- [9] 武帝纪[A]. 晋书(卷三)[C].
- [10] 李培芬. 江左士族与西晋政治[J].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 1995, (10).
- [11] 顾荣传[A]. 晋书(卷六十八)[C].
- [12] 周处传周札附传[A]. 晋书(卷五十八)[C].
- [13] 田余庆. 陈郡谢氏与淝水之战[A]. 东晋门阀政治[C]. 北京: 北大出版社, 1989.
- [14] 曹文柱. 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改变[J]. 历史研究, 1988, (2).
- [15] 孙皓传[A]. 三国志·吴书(卷四八)[C].
- [16] 宋谈淪. 嘉泰吴兴志[M]. (嘉业堂刊本).

(责任编辑:刘曙东)